

导论 现代决策学研究的新领域

决策科学自 20 世纪 40 年代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决策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决策分类、决策过程、决策体制、决策主体、决策原则，以及决策的技术与决策科学的应用等等。他们的研究为决策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现实的决策活动非常复杂。为什么有的决策者热衷于经验的决策，而不相信科学决策的力量？这里除了有的决策者缺乏科学决策的素质之外，在经验的决策中，是否还渗透着科学性、科学文化的因素？为什么有的决策者偏好于非程序、非科学的（不等于排斥科学决策）决策，而把决策的效率、效果作为他决策的出发点？为什么科学的决策有时不能得出满意的结论，也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当我们在宣传与肯定科学决策的力量时，是否有必要再反思一下我们所信仰的科学决策的“科学性”呢？

如果跳出上述研究的领域来思考与研究决策，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科学决策纳入人的活动来考察，可以发现，决策的运思与拍板过程，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因此，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把科学决策当作人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来研究。对决策文化活动的研究，应成为发展与完善现代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部门。

一、决策命题的新审视

什么是决策？

通览国内外决策学论著，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有以下一些说法：

——决策就是下定决心，做出判断。

——决策就是对若干个准备行动的方案进行选择，以期更好地达到目标。

——决策是每个人内心产生的个人事件，包括判断与直觉，正如包括情感与个人价值观系统一样。

——决策指的是人类社会中与确定行动目标等有关的一种重要活动。

关于决策的定义还可以列举许多，但目前能为大多数论者接受的看法有三种：一种是由科学管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科学家赫·西蒙(H·A·Simon)提出的“管理就是决策”；另一种是美国学者E·F·哈里森(E·Frank Harrison)提出的“决策是一个过程”即“是一个有着明确职能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科际整合过程”。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系主任、副教授阿兰·L·帕兹(Alan L·Patz)和该校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阿兰·J·罗(Alan·J·Roue)主编的《管理控制与决策系统》一书中，则把决策当作“一种社会过程”、“一种社会—技术系统”来看待；还有一种是由中国学者于光远提出的“决策就是作决定”。这三种定义，从不同角度深刻揭示了决策所蕴含的意义，所以它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把定义“决策”的视野更放宽一些，可以发现“前两种观点主要是从管理科学角度对决策所下的定义，后一种观点则是就决策讲决策（即作

决定)也就是说 他们关于决策的定义 在涵盖面、抽象的高度方面似还有欠缺。

审视上述种种关于决策的定义,我们可进一步引伸出以下几点认识:(1)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决策下的定义,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应该加以吸收。(2)关于决策的定义 大致涉及四个层面:一是个人决断层面;二是组织管理层面;三是社会过程层面;四是人类社会中与确定行动目标相关的活动层面。(3)无论是个人决断还是组织管理,它都有一个决断、决定的问题,决断或决定都是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对未来实践目标所作出的一种选择与决断。据此,我们可进一步给决策下这样一个定义:决策是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法、途径、策略所作出的决定。这一决策定义 突出了决策在时间上的超前性 即未来性 在内容上的实践性 是为了要实行、执行 在观念上的肯定性 即做出决定或决断 在方案上的可行性。

二、理性决策的偏执

理性决策既指科学理性决策,又指背离了科学理性精神的抽象、空洞的理性决策。抽象的理性决策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不切实际的理性决策,它不仅不能为人们未来的实践指明方向,而且可能把人导入误区,错把抽象理性决策当作科学理性决策 或执迷于抽象理性决策。

从人类认识史来看,理性决策的偏执是在人类的决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现象。原始社会,人类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实践中,产生了早期朴素的决策思想。文字的产生,大大促进了决策活动的发展,并使人类的决策活动发生了突变。文字使人类决策活动的成果从仅只存留在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发展到可能长久记录下来。实际上,这就构成了一次决策的完备的全

过程。这是人类决策历史，也是人类实践活动历史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把人类千万年来的理想和实践结果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从口传心授变成文字形式的记载，不但能使人类的智慧结晶广为流传，而且不因前人的消亡而失掉。这就使人类的智慧加速了积累，并逐渐形成了游离于人类思维与记忆之外的“智慧海”。后人可以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不断地丰富智慧的海洋。

人类的“智慧海”为人们的决策、为古代决策学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诸葛亮所作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与“三分天下，朱元璋采纳”“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建议，创立了明王朝；孙臬为田忌赛马献策而胜齐威王的战术决策；李冰父子设计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妥善解决了分洪、排沙、引水等一系列兴利除害问题的决策，都是凭借决策者个人的阅历、知识与智慧（包括对他人、群体智慧的吸取）进行的，决策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者阅历是否丰富、知识是否渊博、智慧是否过人。有时也利用智囊人物协助，但主要是依靠他们个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所以，从本质上讲，与古代小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决策，都是一种经验决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科学技术日趋专业化、综合化、复杂化，决策问题已经超出了古代社会那种个人狭小的范围，也不可能再停留在个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上，而需要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科学，成为国家和决策集团的职业活动。1948年11月，美国空军系统创建了非营利的兰德公司，1954年以后，又相继出现拉默·伍德里奇公司、斯坦福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等机构。1972年日本神户大学设立了系统工程学科，随后出现了由美国、苏联、日本、加拿大、捷克、法国、联邦德国等17国参加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这些都

是决策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它们往往充当着国家最高领导和社会各界决策人物的“智囊团”的角色，为国家和各界的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决策已由经验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过去那种以个人政治权术和军事战略为专长的智慧，正在被以经济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多学科综合的专家集体所取代。

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权威的确立促进了决策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蕴含着将科学理性抽象化、绝对化而导致决策的理性偏执的一面。诸如生搬硬套科学决策的程序、方法，而不顾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不顾不同地区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科学理性决策功能的弱化；否认经验，或不善于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来分析、决策，但却津津乐道于以往的理论，把一般的、抽象的理论当作具体决策的依据，结果常常会因为脱离现实而使“理性决策”失误；极端推崇或迷信科学理性决策的结论，而忽视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变，也不懂得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中利益杠杆对决策的重要影响，结果使“理性决策”一再碰壁。

因此，我们肯定科学理性决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也必须十分重视科学理性决策在提出与实施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利益关系等的制约与影响，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决策。

三、决策——人的社会文化活动

本书试图从文化的视野考察决策，为此必须阐明：为什么说决策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作为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现象的决策，它要研究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揭示社会文化对人的决策的影响。实际上，这也就是本书的一种理论框架。

(一)

人作为万物之灵，一旦为了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从事生产劳动时，就开始有了认识与决策，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粗浅的决定或决断，现代意义上的决策则是随着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①。但现代心理生物学的发现证明，某些高等动物也具有制造工具的智慧与能力。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并且断言：“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②然而，现代心理学同样证明，某些高等动物也具有符号能力。富兰克林、卡西尔关于人的定义虽不完备，但他们已开始进入人的社会文化活动领域；并试图从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意义上揭示人的本质。

尤其是卡西尔的分析，值得重视。他说：“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赋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悵 (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③换言之，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因此，它们内在地相互联系而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204 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 42、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归根结蒂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历史活动，所有这些活动的产品都是“社会文化产品”。由卡西尔的分析可引伸出如下认识：人是具有高度发达的脑髓、能够自由地运用符合系统的原理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文化的动物。“生命的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①然而，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并非是传说中的种种神灵的赋予，也并非突如其来的“远古第一声雷击”的神秘的启示，它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从动物的本能劳动到专属于人的运用符号系统原理的劳动的转化的过程，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形成的过程，亦即社会文化活动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因为：(1)劳动创造了人，既导致了人区别于动物的匮乏性，又创造了弥补这一不足的人的特殊的遗传基因，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生物学的前提。(2)社会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劳动创造人的进程相伴而行，可供自由驱使的语言象征符号的产生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形成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化活动发生的契机。(3)文化活动的发生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的互相推移使人类从动物‘两种生产’（动物的繁衍与制造工具）中提升出来 作为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动物’出现在世界上。人类的原始文化，正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最初对象化。

人们为社会文化动物，它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决策作为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类产品，其水平基本上是与人类文化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这里就人类文化演进的三种形态来说明决策，揭示决策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反映情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类的远古时代 盛行着一种自然文化。这是人类对大自然崇拜的文明结晶 也是人类对大自然初步认识的产物。在自然文化时期 人往往从自身的需要去看待自然 所以能够不断地把外在的种种自然现象的刺激同化于‘饥欲食 寒欲衣 身体肌肤好逸乐’的主体需要的格局 使之成为人的决断与认识 并在这种决断与认识的指导下去进行社会文化的创造活动。如原始人之所以要通过敲打石块来制成锋利的石器,就在于追击野兽的活动反复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有锋刃的石块比无锋刃的石块更能杀伤野兽 这样主体就对客体 作为自然物的有锋刃的石块 的价值作出了判断和认识 并在实践中开拓了从使用天然的石块到制造石器的转变。又如 原始人发现骑在飘浮的树干上可以横渡一条河 这一发现反复刺激着他们的认识 使他们按照主体活动的需要进行决策 该干什么 如何干 在实践中逐渐地使他们由使用天然的飘浮的树干到用石斧把原木加工成更为安全的独木舟,这一技术发明也就成了人类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 如火的使用、衣服的制作、房屋的建造、作物的种植、金属的发现和冶炼技术的产生等等,也都是如此。

在自然文化时期 原始人的认识与决策能力 是在群体的生产劳动与生活中逐渐孕育、发展起来的。如原始人在人类自身的生产过程中,近亲交配所带来的恶果反复地刺激着进化中的原始人的头脑,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近亲繁殖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的危害性,从而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在头脑中决策与建构着新的两性关系的模式 制定出关于乱伦的禁忌 由群婚转向对偶婚 由族内婚转向族外婚。同时 原始的群体生活也发展了他们的心理能力、想象能力、决策能力 并且又转化为文化创造的活动。最初的艺术常常只是生产过程的简单的重演 但即便是这种最粗糙的艺术 也无不受着原始人各种内在心

理要求的支配。例如 审美意识中对节奏的敏感、对称的心理等等。这些心理特征都是在原始人的劳动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拜尔顿说 在他所知道的非洲原始部落的黑人们那里 音乐的听觉发展得很差 而他们对节奏却敏感得令人吃惊：“划桨人配合着桨的运动歌唱 挑夫一面走一面唱 主妇一面舂米一面唱。”虽然节奏感来自人的生理和心理本性 并且不独限于人类 但原始人为什么在其活动中恰好遵循这种节奏而非另一种节奏，正是由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所决定的。^① 在劳动而导致的文化发生的过程中，人们的想象能力、决策能力也日益丰富起来，并力求通过艺术形式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和想象，来反映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如原始人的舞蹈除了生产过程的简单描写外 还有战争舞、念咒舞、埋葬舞等等 都已体现出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和决断力。在战争舞中 表现出复仇的崇高义愤、勇敢无私的激情和对英雄的崇敬 在念咒舞和埋葬舞中 表现着原始人希望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包括鬼神）为自己谋福利的愿望，以及谋福利方式的决策。

自然文化是超地域的。只要是自然条件相同的地方 都会出现相同的文化结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又开始出现一种同自然文化相对立的人文文化。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自身认识基础上的新型文化。人文文化的形成是人类现代“文明”真正的起点，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这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民俗风土、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形态等 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因此，也有人把这种文化叫做民族文化。

在人文文化时期 社会决策带有天然的专制性、个人崇拜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原因有二：（1）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 其上

参见《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 338—339 页。

层建筑是植根于厚实、稳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在小生产状态下的自耕农和佃农，抵御自然和社会灾祸的能力十分有限，他们的弱小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①封建君主专制决定了“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②这一传统从秦始皇开始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从未断绝。康熙帝称：“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③（2）人文文化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物化在人脑的细胞上，它们随时都受感情或心理因素的干扰。这些“知识”有的只能意会，不便言传；有的可以言传，又不能用文字表达；有的可以用文字表达（如历史），但是又强烈地受到作者本人的内心活动和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影响，有的虽然名为“知识”（如统治者治国之术），但实际上只是个人意志或感情的再现。因此，人文文化时期的决策带有一种公认的神秘感。

产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变成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巨大的社会功能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加之科学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便在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之旁，兴起了一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是由自然文化和人文文化演进而来的高级形态的文化，它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史记·秦始皇本纪》。
《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

统。如果按种属来分，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等不同文化的种属结构。不管这个文化多么复杂，在当代，它们赖以存在的时代标志都是“科学的文化”或者说都是渗透了科学灵魂的文化生态系统（科学文化系统）。

科学文化的进步性，对人的决策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1）它要求人们，做什么事情都应符合科学原则，就是说决策要有科学的根据，要有科学的方法，要有科学的计量指标、科学的评价体系，还要使决策基本上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仅仅有依赖科学程序所形成的科学方案，还不能保证决策的成功。这里还必须要有科学文化作为决策者智力冲动的能源，从而选取最后的方案。（2）要使科学文化成为决策的中介背景。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1939年，科学家发现核裂变反应，爱因斯坦曾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抢先制造原子弹。可是，这封信在总统办公室压了很久，也没有得到批示。后来科学家们通过总统的近臣萨克斯来劝说罗斯福。一天，总统用早餐时，萨克斯给他讲了“拿破仑与富尔顿”的故事。19世纪初，反法联盟军队包围巴黎，有个名叫富尔顿的，是蒸汽船的发明者，去见拿破仑。请求拿破仑采用他的发现，改装法国军舰，但是拿破仑拒绝了。萨克斯说：“如果拿破仑采用了富尔顿的发明，也许近代史要重写。”这一番话打动了罗斯福。罗斯福立即将压了很久的信件批示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就此开始实施。对于一个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建议，总统可以置若罔闻，而一番近似传奇的历史故事，倒勾起决策者的“决策冲动”。显然，科学文化的常识成了总统决策冲动的智力背景。（3）科学的价值观念是决策冲动的背景力量。决策者的直觉判断，虽然表现出决策冲动那样的随机性，但是，隐蔽在这种冲动背后的必然性，却是决策者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文化生态结

构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是文化谱线中很强的正统谱线。它们天然地排斥和限制科学文化。由于科学文化的脆弱，在领导者的价值观念中，科学文化的权重极微，不少干部用以决策的文化背景，基本上停留在人文文化的水平。因此，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提高我国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乃是急迫任务。

总之，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即人的活动从其生产文化产品、构建人类文化大厦、描绘人类文化史的视野来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时期，决策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水平对人们决策的影响，其本身（决策成果）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产品。因此，我们可从文化的视野研究决策，以揭示决策的文化机理。

（二）

我们把决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主要研究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模式、艺术在决策实践中的不同功能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作为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及其艺术对象化的结果——决策意见、决策方案的社会价值。这些研究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大致勾勒古代决策文化思想起源与发展的脉络 揭示古代决策理论的社会文化意蕴。

只要有人、以及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 就有决策和决策思想。不过 在古代 没有科学的决策手段、方法、思想与理论。因此 古人的决策 包括古代思想家的决策 实际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决策。换言之 不同思想家的决策思想是不同社会文化思想、社会文化观念的体现。所以 古代决策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实际上融汇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和理论的发端与发展之中。要研究古代的决策思想与观念 必须要结合古代社

会文化的研究，概而言之，要研究古代思想家的决策文化思想、决策文化理论。通过研究，初步勾勒出古代决策文化思想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揭示古代决策理论的社会文化意蕴，从而为本书的决策文化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 决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决策主体的知识与思维必然受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但科学决策观、科学决策思想的形成，乃至人类决策的革命性变革，又对社会文化活动的进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本书不仅要探讨处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对形成科学决策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要研究软科学是如何为决策奠定科学基础的，新的信息革命是如何影响人类决策的革命性变革的，决策主体的思维结构在科学决策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进行创造性思维。决策活动中的创造性思维，新的信息革命对人类决策发展的巨大影响，又为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注入了新活力。因此，我们把知识、思维放到社会文化的视野中来研究，实际上也是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透视与反思。

第三 知识、思维又是决策主体的一种理性力量。这种理性力量能否成为决策主体的行为指导，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决策主体的行为指导，不仅取决于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的品质，而且与决策主体的行为方式相关。现实的决策主体都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们的决策行为，都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决策行为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这不仅是要从社会文化的视野透视决策行为，以更好地规范决策行为，而且要揭示决策行为的文化底蕴。

第四 无论是对决策主体的知识的探讨，还是对决策主体的思维、行为方式的研究，都是要弄清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决策主体，它的知识、思维、行为方式对形成科学决策的

意义，揭示它们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对决策艺术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决策艺术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决策艺术又是实现决策社会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对决策艺术的研究，又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层面和视角深化对决策主体的文化研究。

第五，决策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结果总会形成一定的决策意见、决策方案。决策意见、决策方案中凝聚着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及其艺术。决策意见、决策方案作为决策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那么，如何认识与评价决策方案这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呢？在直接的层面上看，是对决策主体依赖其知识、思维、行为方式及其艺术而形成的决策意义的一种评价，是对产生决策需求的合理性、决策意义准则的一种鉴定；在间接的更广泛的层面上看，则是对决策方案（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给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定意义的评价。无论是在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层面上，对决策方案的认识与评价，实质上是对决策的社会价值的分析。因此，决策的社会价值是决策文化论研究中必须涉及而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

根据上述问题，本书分上下两篇，其逻辑框架是：

上篇 决策文化 历史的考察。通过对《周易》与古代贤哲决策思想理论的分析，揭示决策文化论的形成与发展，弄清历史上不同思想家决策文化观的表现与特征，从中吸取决策智慧，为现代决策文化理论的构建提供理论前提与丰富的素材。第一章：《周易》与决策文化 探讨决策文化的理论深渊 第二章 古代贤哲的决策文化观 通过对儒、道、法、兵决策思想的比较分析 揭示古代不同思想家决策文化观的一般特征。

下篇 决策文化 主体的文化视野。试图把决策主体纳入社会文化的视野考察，目的在于研究社会文化背景对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方式等的影响，探讨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方式与艺术对形成科学决策的意义，揭示决策主体各要素的文化底蕴，弄清决策的社会价值。第三章 知识与决策 第四章：决策思维，着重研究决策主体的知识与思维对形成科学决策的意义与价值，研究创造性思维、新的信息革命不仅对人类的决策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又给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五章 决策行为 在阐释一般的决策行为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对决策行为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揭示决策行为的文化价值。第六章 决策艺术 它本身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研究决策艺术，使我们能从一个新的层面和视角深化对决策主体的文化研究。第七章 决策的社会价值 着重弄清何谓决策的价值，如何认识决策评价的社会价值尺度。这一章既是对决策文化论研究的一个总结，又提出了一个有价值而又缺少研究的课题。

上篇 决策文化：历史的考察

决策文化是人类大文化的一部分。决策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乃是一种迥然有别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以决断、谋略、预测等样式显示其文化形态。中国传统的决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从研究的角度看，考察决策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从决策的角度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而在研究内容上，重心则在于通过对古代思想家决策思想的分析，揭示决策文化论的形成与发展，弄清历史上不同思想家决策文化的表现与特征，从中汲取决策智慧，为现代决策文化理论的构建提供理论前提与丰富的素材。

第一章 《周易》与决策文化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历经种种坎坷与考验，或褒或贬，时衰时兴，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周易》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吸引和牵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索和发掘它。本书试图从决策文化论的视野作些探讨。

一、《周易》与决策文化观的雏型

决策文化观，作为人类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发端与雏型，可追溯到《周易》。

1. “易”之本义新释

《周易》——

这是一颗闪耀着绿色灵光的神奇瑰宝。

这是一股博大精深的智慧源泉。

这是一部伟大的决策管理的圣典。

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神秘的精神宝藏。

.....

对《周易》还可以作出种种概括，引来种种赞美。然而，在概括、赞美之际，是否应思考一下它的本义呢？关于《周易》的本义，